

马克思主义与拉美社会主义思潮

## 拉美马克思主义的“科尔多瓦学派”

叶健辉

**内容提要：**拉美马克思主义的“科尔多瓦学派”创立于1963年，标志是《过去和现在》杂志在阿根廷第二大城市科尔多瓦的创刊。“科尔多瓦学派”的基本理论资源是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的思想。在理论上，“科尔多瓦学派”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使马克思主义深入拉美社会，建立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引领拉美走向社会主义。在拉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问题上，“科尔多瓦学派”一度对游击战寄予希望，但游击战的失败使“科尔多瓦学派”转向“工厂委员会”道路。由于阿根廷马克思主义组织对阿根廷工会运动影响不大，“科尔多瓦学派”希望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主导阿根廷工会运动的民众主义联合，以此实现社会主义。“科尔多瓦学派”是马克思主义在拉美本土化的一个重要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扎根第三世界的重要成果。与西欧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相比，拉美马克思主义的“科尔多瓦学派”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道路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对同属第三世界的中国来说更具有借鉴价值。

**关键词：**科尔多瓦学派 葛兰西 马克思主义 本土化  
民众主义 何塞·阿里科

**作者简介：**叶健辉，哲学博士，浙江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21) 04-0024-19

1918年，欧洲正由于残酷而漫长的互相屠杀而处于一片凋零之际，阿根廷科尔多瓦大学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此后，大学改革浪潮席卷整个拉美大陆，一部分先知先觉的拉美人开始思考欧洲文明最终导致互相屠杀的悲剧，探索有别于欧洲的文明发展道路。可以说，由科尔多瓦学生运动所引发的拉美大学改革浪潮是发生在拉美的“新文化运动”。就像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促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一样，科尔多瓦大学改革所代表的拉美“新文化运动”也促成了拉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秘鲁的冈萨雷斯·普拉多人民大学的创立就是这次拉美“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曾在该大学给秘鲁普通民众讲课的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1894—1930年）则是拉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有“拉美马克思主义思想之父”<sup>①</sup>的美誉。马利亚特吉所倡导的“印第安美洲社会主义”代表了将马克思主义与拉美现实相结合的尝试：马克思主义将激发拉美印第安劳动者的热情，推动拉美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就像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代表了超越欧洲的道路一样，在拉美人马利亚特吉这里，马克思主义也是超越欧洲式悲剧的希望。就像中国共产党是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总结一样，可以说，马利亚特吉的“印第安美洲社会主义”也是对拉美“新文化运动”的总结。但与中国共产党后来在血与火的革命考验中逐渐成熟、独立自主地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不同的是，马利亚特吉在1930年年仅36岁时便逝世，拉美各国共产党没有能够坚持马利亚特吉所代表的“将马克思主义与拉美现实相结合”的原则，而是亦步亦趋地照搬照抄外国经验，本土化马克思主义没有能够在拉美发展壮大，马克思主义没有能够深入拉美社会，普遍被拉美民众视为“舶来品”。20世纪拉美第一波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但马利亚特吉所倡导的“印第安美洲社会主义”无疑为拉美本土化马克思主义树立了一个典范。巧合的是，20世纪拉美第二波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尝试也与阿根廷的科尔多瓦相关：20世纪60年代，阿根廷出现了一群以科尔多瓦为活动中心的马克思主义者。仿照西欧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提法，本文称之为拉美马克思主义的“科尔多瓦学派”。“科尔多瓦学派”的中心人物是另一个“何塞”即何塞·阿里科（1931—1991年）。“科尔多瓦学派”与一份名为《过去和现在》（*Pasado y Presente*）

<sup>①</sup> Marc Becker, *Mariátegui and Latin American Marxist Theory*, Athens, Ohio: Ohio Universit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3, p. 55.

的杂志紧密相连。

## 一 “科尔多瓦学派”的创立

后来成为拉美左派神话的杂志《过去和现在》的名字源自20世纪意大利反法西斯斗士葛兰西，因其《狱中札记》的其中一卷就叫《过去和现在》。1947年，葛兰西同亲友的通信集《狱中书简》出版，获得意大利知识界耆宿克罗齐等人的高度赞赏，并获得意大利重要的文学奖项“维阿雷焦奖”。由于其意大利共产党主要创始人的身份和所拥有的文化影响，葛兰西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典范。阿根廷共产党迅速展开对葛兰西著作的翻译，使拉丁美洲成为先于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引介葛兰西思想的地区<sup>①</sup>。负责葛兰西著作译介工作的是阿根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埃克托尔·阿戈斯蒂（1911—1984年）。葛兰西的《狱中书简》在1950年便译为西班牙文，由阿根廷共产党的一个出版社劳塔罗（Lautaro）出版社出版。葛兰西的主要著作六卷本《狱中札记》的其中四卷《历史唯物主义和克罗齐的哲学》《知识分子和文化组织》《文学和民族生活》和《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及现代国家的札记》的西班牙文译本也分别于1958年、1960年、1961年、1962年由同一个出版社出版，并通过拉丁美洲互相联系的共产党网络进入拉丁美洲各国。作为阿戈斯蒂领导下的译介团队的一分子，30岁左右的年轻共产党员阿里科翻译了葛兰西札记的其中两卷：《文学和民族生活》和《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及现代国家的札记》<sup>②</sup>。有关葛兰西思想的讨论还会出现在阿戈斯蒂主编的阿根廷共产党文化刊物《文化纪事》（*Cuadernos de Cultura*）上。围绕在阿戈斯蒂周围的阿里科等年轻的“葛兰西主义者”是当时阿根廷共产党内文化革新潮流的代表。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苏联共产党官方开始反思斯大林主义遗产的消极方面，同时还发生了古巴革命和中苏论战等重大事件，年轻一代共产党员开始思考切合拉美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葛兰西的思想是一个触发点。

1962年，奥斯卡·德尔巴科（Oscar del Barco，1928年—）在《文化纪

<sup>①</sup> Elvira Concheiro Bórquez, “Gramsci en América Latina”, en Massimo Modonesi (coord.), *Horizontes Gramscianos. Estudios en Torno al Pensamiento de Antonio Gramsci*, México: UNAM, 2013, p. 261.

<sup>②</sup> Raúl Burgos, *Los Gramscianos Argentinos; Cultura y Política en la Experiencia de Pasado y Presente*, Buenos Aires: Siglo XXI de Argentina Editores, 2004, pp. 42-43.

事》第59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葛兰西及“客观性”问题的几个注脚》的文章。这是对阿根廷共产党元老劳尔·奥利维里（Raúl Olivieri）在《文化纪事》第58期上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决定论问题》一文的批评。年轻的德尔巴科展示了葛兰西对“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批评，指出独立于人的客观性是不存在的，所谓客观总是“人道的客观”或“历史的主观”，并认为葛兰西这个观点是对客观性问题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解决<sup>①</sup>。阿根廷新一代共产党员和老一代共产党员之间的冲突由此爆发。之后，双方继续就各自观点展开交锋，直到1963年讨论终止，德尔巴科被阿根廷共产党官方要求撤回观点。阿里科、德尔巴科等年轻一代阿根廷共产党员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创办了具有明显葛兰西主义色彩的《过去和现在》杂志，该杂志的创办标志着“科尔多瓦学派”的创立。《过去和现在》杂志的4名主要成员阿里科、德尔巴科、基斯科夫斯基（Samuel Kieczkovsky）和施穆克勒（Héctor Schmucler，1931年—）于1963年被开除党籍，科尔多瓦大学的一批青年学生也跟着离开了阿根廷共产党<sup>②</sup>。这些人就是“科尔多瓦学派”的最早成员。身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因创立“革命先锋队”<sup>③</sup>而同时被逐出阿根廷共产党的波尔坦蒂埃罗（Juan Carlos Portantiero，1934—2007年）也加入了这个“科尔多瓦学派”。以《过去和现在》杂志为中心的群体就此开始了在阿根廷共产党之外探索拉美化马克思主义的历程。

《过去和现在》杂志是季刊，有过两个发行期，第一个发行期是1963—1965年，第二个发行期是1973年。第一个发行期的第一期为1963年4—6月期，最后一期为半年期：1965年4—9月期，总共发行了9期，但有3期是两期合并发行，因而实际发行6期。第二个发行期发行过3期，其中一期为两期合并发行，实际发行两期。仅凭这几期杂志还不能造就一个左派神话。从1968年起，“科尔多瓦学派”开始编译出版“过去和现在纪事”（*Cuadernos de Pasado y Presente*）丛书，到1983年止，以每年出版6~7本书的速度，总共编译出版了98本书。也就是说，“过去和现在”不只是一个杂志的名字，还是一套丛书的名字。起初这套丛书以“过去和现在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因而“过去和现在”还是一个出版社的名字。“过去和现在”这群人还重新组织翻译了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可以说，

<sup>①②③</sup> Raúl Burgos, *Los Gramscianos Argentinos: Cultura y Política en la Experiencia de Pasado y Presente*, Buenos Aires: Siglo XXI de Argentina Editores, 2004, pp. 55-56, p. 69, p. 79.

“科尔多瓦学派”为拉美左派提供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图书馆。与“法兰克福学派”专注于文化问题不同的是，“科尔多瓦学派”这群年轻人不单单讨论理论问题，还实际参与政治斗争，有些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实践为自己的主义正名，他们也用自己的理论支撑自己的斗争，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像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一样不是抽象、僵硬的理论体系，而是活生生、具有强烈社会感召力的历史现实。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1963—1983年这20年是拉美左派的“过去和现在”时期或“科尔多瓦学派”时期，关于左派的一切，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踪迹。因而，有人认为，“科尔多瓦学派”的中心人物阿里科是“西班牙语世界几乎整个马克思主义文献库的发明者”<sup>①</sup>。

在《过去和现在》杂志第1期，阿里科写了一篇类似于“发刊词”的文章，题目就叫《过去和现在》。循着葛兰西的基本思路，阿里科将马克思主义界定为拒绝一切物化、与历史变化同行的“实践哲学”<sup>②</sup>。马克思主义要成为“大众的哲学”<sup>③</sup>，深入到阿根廷普通民众之中，成为阿根廷革命集体意志形成过程的一部分，而不能仅仅是自我封闭的“客观规律体系”或“真理的储藏室”，因为“历史不是不可避免的规律统治的领域，而是通过为达到目标而不懈斗争的人们努力的结果，尽管这种努力要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sup>④</sup>。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指引人们实现自由和解放的行动指南。阿根廷共产党长期以来的基本问题就在于，没有能够融入阿根廷底层民众的斗争之中，从而无法形成强有力的“人民—民族”联结，而只是一个封闭的小圈子，因而对阿根廷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马克思主义需要具体地、历史地化入人民的生活、融入人民的情感，才能为一种新的文明奠定基础。这需要造就能够与普罗大众同呼吸共命运的“新型知识分子”<sup>⑤</sup>。斯大林主义式的“客观规律体系”预先决定了一切，无法鼓舞人们的斗争热情，因此，秉承斯大林主义教条的阿根廷共产党很难在阿根廷底层人民中生根。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是：斯大林主义认为，在阿根廷这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不具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必须先进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之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影响广泛的“革命阶段论”。由此，阿根廷的资

<sup>①</sup> Oscar Ariel Cabezas, “Antonio Gramsci, Un Latinoamericano Heterodoxo”, en Oscar Ariel Cabezas (comp.), *Gramsci en las Orillas*, Adrogué: Ediciones La Cebra, 2015, p. 101.

<sup>②③④⑤</sup> José Aricó, “Pasado y Presente”, en *Pasado y Presente*, abril-junio, 1963, p. 5, p. 17, p. 3, p. 15.

产阶级被赋予历史的“进步性”和“革命性”，阿根廷共产党需要与资产阶级合作而非对抗，这样，共产党就成了一种保守的、维持既定秩序的力量，而不是一种革命的、改变现状的力量。而深受阿根廷底层人民支持、于1946—1955年担任总统的庇隆则被阿根廷共产党斥为法西斯主义者、煽动家。在1955年庇隆政府被军方推翻之后，阿根廷共产党支持军政府，这使阿根廷共产党站到了阿根廷底层人民的对立面，这个形象几乎彻底断送了阿根廷共产党深入社会的可能性。对于阿里科这样的年轻共产党员来说，必须突破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樊篱，寻找一种批判的、历史的、“战斗的马克思主义”<sup>①</sup>，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

虽然“科尔多瓦学派”明显倾向于葛兰西的立场，但《过去和现在》并不局限于葛兰西一脉，还会涉及其他思潮。从理论上讲，“科尔多瓦学派”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置入当时的时代背景，展开马克思主义与各种思潮的对话，以此展示马克思主义的生机活力。与阿根廷共产党不同的是，“科尔多瓦学派”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而只是一个松散的文化团体，人员构成很不稳定，杂志分发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加上当时阿根廷社会政治形势不断激化，最终导致该国在1966年6月又发生了一次军事政变，需要定期发行的《过去和现在》杂志在1965年9月中止发行。这时，另一种联结知识分子与人民的构想出现了：编译“过去和现在纪事”丛书。和《过去和现在》杂志一样，“过去和现在纪事”丛书也志在重构左派文化，以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能力，使马克思主义根植于阿根廷社会。简单地说，1963年创立的“科尔多瓦学派”是对阿根廷共产党秉承的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其基本理论意图是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切合阿根廷社会现实，建立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主导力，引导阿根廷走向社会主义，其实现这一意图的基本理论资源则是倾向于“绝对历史主义”的葛兰西思想。

## 二 “科尔多瓦学派”对拉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

由于古巴革命的胜利，20世纪60年代拉美盛行格瓦拉主义。格瓦拉主义往往表现为“游击中心主义”，认为“游击中心”可以取代传统革命党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格瓦拉主义代表了整个60年代的一种

<sup>①</sup> José Aricó, “Pasado y Presente”, en *Pasado y Presente*, abril - junio, 1963, p. 10.



时代风潮：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斗争改天换地。或者说，格瓦拉主义代表了某种“唯意志论”。这一点跟葛兰西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的“绝对历史主义”形成了共鸣，因而，坚持葛兰西主义的“科尔多瓦学派”在1963年曾经接近在阿根廷西北部萨尔塔省活动的一支游击队即“人民游击军”（Ejército Guerrillero del Pueblo）<sup>①</sup>。这支游击队被视为格瓦拉在南美大陆发动革命这一宏伟计划的一部分。“科尔多瓦学派”为这支游击队提供过后勤支持，但这支游击队很快就遭到阿根廷政府镇压，“科尔多瓦学派”的主要创始成员之一基斯科夫斯基被指控为游击队的一分子而入狱近一年。<sup>②</sup>这样的状况难以继续，“科尔多瓦学派”很快放弃了通过游击战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

就像葛兰西将工厂视为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一样，“科尔多瓦学派”也回到了工业世界，具体而言，是回到了科尔多瓦劳工世界，希望以科尔多瓦劳工为支点实现社会主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科尔多瓦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成为阿根廷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意大利的菲亚特、美国的伊卡—雷诺、英国的铂金斯等工业企业在科尔多瓦设立了生产基地。更早前科尔多瓦就已是阿根廷的军事工业中心，有一批军工厂坐落于此。科尔多瓦的人口也经历了飞速增长，1966年已经达到68万，这使科尔多瓦成为一个活跃的劳工运动中心<sup>③</sup>。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历史悠久的科尔多瓦大学有6万学生，占科尔多瓦市总人口的近10%。在“科尔多瓦学派”眼里，科尔多瓦就是“阿根廷的都灵”<sup>④</sup>。就像葛兰西在意大利工业城市都灵思考意大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样，阿里科等人也在科尔多瓦思考阿根廷社会主义革命。就像葛兰西在《新秩序》中强调“工厂委员会”的重要性一样，“科尔多瓦学派”也将阿根廷社会主义革命的希望寄托在阿根廷劳工运动身上。

就在1966年6月，翁加尼亚（Juan Carlos Onganía）将军领导发动了号称“阿根廷革命”的军事政变。政变后的军政府几乎取消了任何形式的民众参与：关闭国会、禁止组党，甚至关闭了大学。军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令打压工人，事实上取消了工会的罢工权，取消了集体谈判并冻结工资20个月<sup>⑤</sup>。这使工会运动发生分化。1968年3月，阿根廷劳工总联盟（CGT）分成了两派：主张跟政府合作的保守派和主张跟政府对抗的激进派。激进派组成了

---

<sup>①②③④⑤</sup> Raúl Burgos, *Los Gramscianos Argentinos: Cultura y Política en la Experiencia de Pasado y Presente*, Buenos Aires: Siglo XXI de Argentina Editores, 2004, p. 83, p. 86, p. 66, p. 63, p. 127.

“阿根廷人的劳工总联盟”（CGTA）。科尔多瓦工会尤其是激进派最活跃的中心<sup>①</sup>，科尔多瓦成了阿根廷的“风暴眼”。甚至一向保守的天主教会方面也出现了激进化现象，掀起了“人民神学”运动：一部分天主教教士号召为第三世界人民的解放而斗争，这些教士被称为“为了第三世界的教士”。1968年5月，他们在科尔多瓦召开了“为了第三世界的教士运动”第一次全国会议<sup>②</sup>。面对激化的社会形势，军政府方面则以强力弹压的方式加以应对。于是，在1969年5月29日发生了影响深远的“科尔多瓦事件”。为声援遭到政府镇压的青年学生，阿根廷劳工总联盟宣布于1969年5月30日举行一次为期24小时的总罢工。科尔多瓦工会则决定将罢工时间延长到48小时，提前一天从5月29日开始罢工。5月29日，科尔多瓦城瘫痪，政府方面出动军队镇压，导致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上千人被捕，这就是著名的“科尔多瓦事件”<sup>③</sup>。“科尔多瓦事件”引发了连锁反应，导致之后阿根廷全国各地发生类似事件，极大地动摇了军政府的统治，被许多人视为“阿根廷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sup>④</sup>。以文化出版为中心的“科尔多瓦学派”没有直接参与工会运动的组织和领导，但一批受到《过去和现在》影响的青年学生走进了工人世界，将“科尔多瓦学派”的影响带进了科尔多瓦劳工运动。到1969年5月“科尔多瓦事件”发生，“科尔多瓦学派”于1968年3月开始编译的“过去和现在纪事”丛书已经出版了7本书，其中阿尔都塞的文集《作为革命武器的哲学》、塞罗尼（Cerroni）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 I》和高兹等人关于法国“五月风暴”的《法国1968：一次失败的革命？》这几本书在学生中间产生了很大影响<sup>⑤</sup>。“科尔多瓦学派”希望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与阿根廷民众的血肉联结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实。

但真正将“科尔多瓦学派”推上风口浪尖的是其与庇隆主义运动内部的激进派“蒙托内罗斯派”（Montoneros）<sup>⑥</sup>的接近。在1955年军事政变之后，庇隆本人流亡欧洲，在阿根廷国内兴起了庇隆主义运动。在1966年6月军事政变之后，特别是在1969年5月29日“科尔多瓦事件”之后，阿根廷社会

① Raúl Burgos, *Los Gramscianos Argentinos: Cultura y Política en la Experiencia de Pasado y Presente*, Buenos Aires: Siglo XXI de Argentina Editores, 2004, pp. 128-129.

② Sebastián Politi, *Teología del Pueblo. Una Propuesta Argentina a la Teología Latinoamericana (1967 - 1975)*, San Antonio de Padua, Argentina: Ediciones Castañeda; Buenos Aires: Editorial Guadalupe, 1992, p. 154.

③④⑤⑥ Raúl Burgos, *Los Gramscianos Argentinos: Cultura y Política en la Experiencia de Pasado y Presente*, Buenos Aires: Siglo XXI de Argentina Editores, 2004, p. 131, pp. 131-132, p. 137, p. 169.



形势进一步激化，庇隆主义运动内部出现了一股强大的激进力量，“蒙托内罗斯派”是这股力量的代表，它注重武装斗争，可以说是一支“庇隆主义游击队”。使“蒙托内罗斯派”登上阿根廷历史舞台的时间是1970年5月29日，即“科尔多瓦事件”周年纪念日。在这一天，“蒙托内罗斯派”绑架了曾经于1955—1958年担任军政府总统的阿兰布鲁（Pedro Eugenio Aramburu）将军<sup>①</sup>。绑架阿兰布鲁将军事件导致了严重的危机，迫使军政府更换总统，但阿根廷社会的紧张局面没有随之缓解，绑架、枪杀、爆炸等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政府方面以同样的暴力还以颜色。“蒙托内罗斯派”成为阿根廷民众反对军政府统治的一面旗帜。与此同时，工会运动也是此起彼伏，与其他要求变革的社会力量彼此呼应。要求终结军政府统治的呼声越来越高，最终，军政府决定还政于民，于1973年3月进行选举，得到庇隆本人认可的“正义主义解放阵线”（Frejuli）候选人坎波拉（Héctor Cámpora）以压倒性优势赢得总统选举。此时，“蒙托内罗斯派”已经成为阿根廷举足轻重的政治—军事力量。

军政府的终结为《过去和现在》杂志再次发行创造了条件。与1963—1965年那个发行期主要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不同的是，1973年的这个发行期与当时阿根廷的社会形势紧密相连。如果说《过去和现在》的第一个发行期是与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告别，那么，《过去和现在》的第二个发行期则是与“蒙托内罗斯派”所代表的“革命庇隆主义”<sup>②</sup>的握手。1973年第1期类似“发刊词”的文章《阿根廷走向社会主义的“长征”》奠定了重新发行的《过去和现在》的底色：探讨阿根廷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道路。在该文中，阿里科等人明确指出，在阿根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工人阶级领导其他被压迫阶级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资本的统治已经不再是一个乌托邦<sup>③</sup>。更具体地，阿里科等人说：“在1973年的阿根廷，摧毁资本主义不再是一个梦想，而已经是一种经济、社会、政治的必要性。”<sup>④</sup>资本主义制度的“霸权危机”已经暴露。现实已经表明，资本主义是一个非理性的制度，无力解决自身的矛盾。但与通常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危机不同的是，阿里科等人认为，这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已经不再能够确保生产的发展或经济的扩张，而是

<sup>①</sup> Raúl Burgos, *Los Gramscianos Argentinos: Cultura y Política en la Experiencia de Pasado y Presente*, Buenos Aires: Siglo XXI de Argentina Editores, 2004, p. 173.

<sup>②③④</sup> “La ‘Larga Marcha’ al Socialismo en la Argentina”, en *Pasado y Presente*, abril-junio, 1973, p. 21, p. 4, p. 12.

因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充分利用现存潜能的一个障碍<sup>①</sup>。为什么这么说呢？阿里科等人指出，在阿根廷这样的“依附性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扩张不是社会进步的基础，恰恰相反，经济扩张阻碍了社会进步，阻碍了社会福祉的扩散。具体地说就是，帝国主义—大地主—资产阶级—官僚阶层之间的联盟阻碍了劳工阶级社会权利的伸张。其基本结论是：“如果不与依附关系决裂，不从根本上拒绝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落后’问题就无法解决，而只能越来越尖锐，直到触及不可容忍的界线。”<sup>②</sup>阿里科等人就此指出，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将同化整个世界、从而使整个世界进入发达资本主义的论断是错误的，因为在现实中，帝国主义并不同化所有地区，而是创造并维持欠发达地区的存在。因此，欠发达就不是一种“落后”，而是整个世界性资本主义体系的本质性组成部分。由于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积累同时也是世界规模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地球上广大地区都出现了对抗性的紧张局面，因而，没有任何一个地区是不成熟的、不适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sup>③</sup>。也就是说，拉美不需要先进行反对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发展资本主义以便为社会主义准备客观条件、之后再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需要直接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科尔多瓦学派”显然是在突破阿根廷共产党所持守的“革命阶段论”。

由于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矛盾的主要承担者，因而自然成为革命的担纲者，但跟葛兰西的看法一样，阿里科等人也认为，革命并不能自动产生。革命不是经济崩溃的必然结果，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发展。在极端严峻的危机中，夺取权力有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但革命从根本上来讲来自一种深刻的历史变革<sup>④</sup>。用葛兰西的话来说，革命的“新秩序”来自工厂里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因而，革命不是先锋队组织夺取国家权力的瞬间，而是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变革社会关系的“长征”<sup>⑤</sup>。革命必须变革政治权力结构本身，而不是简单地将权力当作“物”一样加以夺取。将政治权力自然化、中立化、物化是资产阶级维系其统治的一种方式，其目的在于使民众陷于政治冷漠。因而，需要将“没有任何东西是自然的、非政治的”<sup>⑥</sup>这样的观念植入民众心中，唤起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资本主义的东西不能简单地拿过来为社会主义所用，因为“社会主义不是生产力‘理性’发展的

<sup>①②③④⑤⑥</sup> “La ‘Larga Marcha’ al Socialismo en la Argentina”, en *Pasado y Presente*, abril-junio, 1973, p. 4, p. 5, p. 6, p. 7, p. 29, p. 8.

逻辑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是进步的一种新方向，社会主义的实现需要一种质的飞跃”<sup>①</sup>。社会主义革命不是要打造一个“正义的国家”，而是要使“国家消亡”，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更重要的是，这种与资本主义决裂的社会不是革命的后果，而是在革命发生之前就存在的状况。同《新秩序》时期的葛兰西相近，阿里科等人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工人自治”，其基本图景是“一个工厂委员会网络”<sup>②</sup>。

一个基本的问题是：阿根廷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不在阿根廷马克思主义组织。在此，阿里科等人特别指出，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依附性地区，除了中国和印度支那地区的共产党顶住共产国际的压力实现了与当地工人运动的联结之外，其他地区的共产党对当地工人运动的影响都很小<sup>③</sup>。因此，在阿根廷，只能在共产党之外寻找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阿里科等人认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在庇隆主义运动身上，而使这种可能性不至于流产的可能性，则在革命庇隆主义者的肩上。”<sup>④</sup>也就是说，“科尔多瓦学派”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民众主义的联合，具体而言是与庇隆主义，尤其是庇隆主义内部的激进派即“蒙托内罗斯派”联合。与“蒙托内罗斯派”的接近使“科尔多瓦学派”被有些人视为“蒙托内罗斯派”的“官方喉舌”<sup>⑤</sup>。简言之，就拉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问题，“科尔多瓦学派”的基本观点是：拉美马克思主义需要通过民众主义的结合深入拉美社会，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科尔多瓦学派”的这个基本观点与20世纪20年代马利亚特吉所倡导的“印第安美洲社会主义”异曲同工：马利亚特吉要求争取印第安劳工的支持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而“科尔多瓦学派”则要求争取阿根廷劳工的支持以使马克思主义深入阿根廷社会。由于阿根廷劳工运动的领导权在庇隆主义所代表的民众主义手里，因此马克思主义需要与民众主义联手。由于印第安人在阿根廷人口中的比例很小，“科尔多瓦学派”不需要考虑“印第安人问题”，因而其基本思想无须概括为“印第安美洲社会主义”。也许，可以将“科尔多瓦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概括为“革命民众主义社会主义”。

---

<sup>①②③④</sup> “La ‘Larga Marcha’ al Socialismo en la Argentina”, en *Pasado y Presente*, abril-junio, 1973, p. 10, p. 17, p. 19, p. 192.

<sup>⑤</sup> José M. Aricó, *La Cola del Diablo. Itinerario de Gramsci en América Latina*, Buenos Aires: Siglo XXI Editores, 2005, p. 104.

### 三 “科尔多瓦学派”对拉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反思

“革命庇隆主义”没有成功，其基本原因是庇隆本人不认可。1973年6月，庇隆本人在结束18年的流亡生活之后回到阿根廷，在之后再次举行的选举中当选，于1973年10月第三次就任阿根廷总统。在军政府时期，“蒙托内罗斯派”的激进立场受到广泛支持，但在庇隆回国并执政之后，该派越来越成为一个“异类”。1974年5月，在庇隆生前举行的最后一次盛大集会中，庇隆直斥“蒙托内罗斯派”是一群“愚蠢”的青年。由此，“蒙托内罗斯派”很快陷于孤立，于是这群“革命庇隆主义者”开始反对庇隆本人。庇隆于1974年7月去世之后，总统职位由其夫人继任。在庇隆夫人执政时期，阿根廷社会继续处于紧张之中。很可能是由于看到庇隆政府也不能稳定国内局势，以魏地拉将军为首的军方于1976年3月再次发动政变，之后7年，阿根廷再次进入严酷的军政府时期。很快，“科尔多瓦学派”不得不流亡，阿里科等人来到了墨西哥。流亡墨西哥期间，阿里科等人回到了文化出版这个“本业”。除了继续出版“过去和现在纪事”丛书之外，阿里科还主持编译“社会主义思想图书馆”和“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图书馆”丛书<sup>①</sup>。另一方面，由于远离阿根廷的社会政治生活，“科尔多瓦学派”得以充分展开对拉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反思，阿里科等人开始写下篇幅较长的著作。

阿里科本人于1980年出版了讨论马克思主义与拉丁美洲关系问题的著作《马克思与拉丁美洲》，可以说，该书是“科尔多瓦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品之一，其地位相当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启蒙辩证法》。“科尔多瓦学派”的这部重要著作是对阿根廷马克思主义未能与阿根廷工人阶级实现血肉联结这种“阿根廷左派悲剧”<sup>②</sup>的系统反思。《马克思与拉丁美洲》回溯到马克思本人1857年关于拉丁美洲“解放者”玻利瓦尔的文章《玻利瓦尔—伊—庞特》<sup>③</sup>。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对玻利瓦尔颇为轻蔑。我们在马克思的文章中看不到玻利瓦尔有什么才能，相反，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一个碰到强敌就放弃

<sup>①</sup> Raúl Burgos, *Los Gramscianos Argentinos: Cultura y Política en la Experiencia de Pasado y Presente*, Buenos Aires: Siglo XXI de Argentina Editores, 2004, p. 246.

<sup>②</sup> Marcelo Starcenbaum, “Gramsci y Althusser en la Experiencia de Pasado y Presente”, en Oscar Ariel Cabezas (comp.), *Gramsci en las Orillas*, Adrogué: Ediciones La Cebra, 2015, p. 179.

<sup>③</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25-241页。

战斗的临阵脱逃者。在马克思的文章中，玻利瓦尔的胜利多半被归功于运气或外人的帮助，特别是英国军团的帮助。文章还特别强调玻利瓦尔参加各种凯旋仪式和宴会的场景，似乎玻利瓦尔的主要长处就是其贵族身份。一句话，玻利瓦尔在马克思看来是拿破仑的拙劣模仿者或拉丁美洲的拿破仑三世，配不上拉丁美洲的“解放者”这个称号。致力于人类解放的马克思对致力于拉丁美洲解放的玻利瓦尔的这种轻蔑，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拉丁美洲的“错遇”问题。使这个“错遇”更错的是，据墨西哥学者阿图罗·查沃利亚（Arturo Chavolla）考证，马克思的这篇篇幅并不长的文章有近20处史实上的错误<sup>①</sup>。首先，马克思搞错了玻利瓦尔的名字，“庞特”是玻利瓦尔父亲的母方姓，而不是玻利瓦尔本人的母方姓，玻利瓦尔本人的母方姓是“帕拉西奥斯”，因此，马克思这篇文章的题目应该是《玻利瓦尔—伊—帕拉西奥斯》。马克思说玻利瓦尔在巴黎待了“几年”，实际上却是“几周”，马克思说玻利瓦尔于1809年回国，实际上却是1807年<sup>②</sup>。除了这种小错误之外，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是，马克思在文章中认为英国军团对玻利瓦尔所领导的独立战争几乎起了决定性作用。阿图罗·查沃利亚指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当时西班牙方面有近10万人，而英国骑士团只有300人左右，不可能在对阵西班牙10万大军中发挥这么大的作用<sup>③</sup>。应该说，马克思关于玻利瓦尔的文章“错遇”了拉丁美洲历史上最大的英雄之一。

马克思为什么会“错遇”拉丁美洲？其中一种解释是：在马克思写作此文的1857年前后，对拉丁美洲独立战争还缺乏系统研究，文献有限，马克思征引的文献包含了对玻利瓦尔的偏见。结论是，马克思不自觉地继承了当时流行的对玻利瓦尔的看法。阿里科在《马克思与拉丁美洲》一书中认为，这种解释无法成立。恰恰相反，马克思的观点实际上是逆流而行。在1857年前后，已经有很多声望卓著的欧洲人开始正面评价玻利瓦尔<sup>④</sup>。也就是说，马克思不是“不自觉地”接受了相关文献中所包含的偏见，而是“自觉地”将那些正面评价玻利瓦尔的文献撇在了一边。

真正需要解释的问题是：马克思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者说，马克思为什么要“故意”错过拉丁美洲？一种常见的解释是：马克思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者”，贬低美洲对马克思来说是非常自然的。马克思终身尊重的黑格尔就

<sup>①②③</sup> Arturo Chavolla, *La Imagen de América en el Marxismo*, Saarbrücken: Editorial Académica Española, 2011, p. 12, p. 12, p. 18.

<sup>④</sup> José Aricó, *Marx y América Latina*, México: Alianza Editorial Mexicana, 1982, p. 121.



认为，欧洲人是充满活力的，能够创造历史的民族，其他民族则死气沉沉，是“没有历史的民族”。由此，可以顺理成章地解释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对殖民地国家的轻视：欧洲是“文明”民族，殖民地的“野蛮”人不能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反对欧洲的“资本主义扩张”<sup>①</sup>。也可以解释阿根廷共产党所信奉的“革命阶段论”：殖民地国家太“落后”，需要先变成“先进的欧洲”，经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才能创造“历史”，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阿里科不接受这种解释，认为马克思的立场在1848年经历了一次“决定性的转折”<sup>②</sup>，此后逐渐突破了“欧洲中心主义”樊篱。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认为市场的扩张已经到达顶峰，即将迎来无产阶级革命，但1848年革命的失败表明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由此而转向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更深入的探究。1851—1862年间，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一系列文章就是对资本主义新发展的具体分析。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从狭隘的“欧洲主义”真正变成了“世界主义”：土耳其、印度、中国、俄国等国家纷纷成为马克思的关注点。阿里科认为，马克思在1858年已经转向了这样的观点：只要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国家和依附性国家获得进展，就不能指望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取得成功<sup>③</sup>。也就是说，不再是欧洲的变化决定欧洲以外世界的变化，而是相反，欧洲之外的变化成了欧洲变化的先决条件。马克思已经成了真正的“世界公民”，而不再是一个局限于欧洲视野的人。阿里科指出，马克思在“爱尔兰问题”上的转变尤其能够说明问题。马克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认为，只能通过英格兰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爱尔兰的独立和解放。但从1867年起，马克思认为英格兰工人阶级受益于英格兰对爱尔兰的殖民掠夺<sup>④</sup>。在写于1870年4月9日的《马克思致齐格弗里德·迈耶尔和奥古斯特·福格特》的信中，我们可以读到：“英国作为资本的大本营，作为至今仍统治着世界市场的强国，在目前对工人革命来说是最重要的国家，同时它还是这种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业已成熟的唯一国家。因此，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就是国际工人协会最重要的目标。而加速这一革命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爱尔兰独立。因此，“国际”的任务就是到处把英国和爱尔兰的冲突提到首要地位，到处都公开站在爱尔兰方面。

<sup>①</sup> Néstor Kohan, *Marx en Su (Tercer) Mundo: Hacia Un Socialismo No Colonizado*, La Habana: Centro de Investigación y Desarrollo de la Cultura Cubana Juan Marinello, 2003, p. 45.

<sup>②③④</sup> José Aricó, *Marx y América Latina*, México: Alianza Editorial Mexicana, 1982, p. 58, p. 61, p. 65.



伦敦中央委员会的特殊任务就是唤醒英国工人阶级，使他们意识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sup>①</sup>。

在此，不是英格兰工人解放爱尔兰人，而是爱尔兰人成了英格兰工人解放的条件。如果将英格兰视为“欧洲”，那么，这里的爱尔兰就相当于“殖民地”。如此，殖民地人民就不再是“没有历史的民族”，马克思已经超越了黑格尔的观点。阿里科特别指出，在对俄国问题的分析中，马克思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俄国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避免先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可能性”<sup>②</sup>。也就是说，俄国不需要先变成“欧洲”，然后才能进行超越欧洲的革命，恰恰相反，俄国需要避免成为“欧洲”才能成就超越欧洲的社会主义。“欧洲中心主义”不能解释马克思与拉丁美洲的“错遇”。

应该怎么解释马克思“错遇”拉丁美洲呢？阿里科认为，要在马克思的“反波拿巴主义”<sup>③</sup>立场中说明其贬低玻利瓦尔的原因。马克思对法国1848年革命最后导致拿破仑三世政变的欧洲经验总结形成了马克思的“反波拿巴主义”：国家是寄生在社会肌体上的毒瘤。国家对马克思而言是一种寄生性、反革命的存在，革命只能在底层人民中寻找。但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恰恰具有类似于1848年革命的性质：独立战争是由玻利瓦尔这样的精英领导的，但这些精英并不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sup>④</sup>。对马克思来说，玻利瓦尔就是拉丁美洲的拿破仑三世。这是对马克思“错遇”拉丁美洲的政治解释。阿里科对这个问题还有一种理论解释：马克思思想的“非系统性”<sup>⑤</sup>或未完成性。随着历史的发展，马克思的思想也会与时俱进。为与历史共进退，马克思一再突破其先前的观点。马克思的思想竭力成为一个完全的“系统”，但在这个“系统”周围存在许多不能吸收进去的“逃逸点”<sup>⑥</sup>。如果条件成熟，马克思会构造一个新的“系统”，使这些“逃逸点”也成为“系统”的一部分，但很遗憾，马克思在生前没能完成其思想“系统”。拉丁美洲问题就是其中一个还没有完全进入“系统”的“逃逸点”。如此，马克思对玻利瓦尔和拉丁美洲的看法就是临时的看法，并不是不可更改的“定论”。就像马克思一度对英格兰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大加赞扬，而在英格兰与沙皇俄国合作时又加以斥责一样，马克思对玻利瓦尔和拉丁美洲的判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9页。

②③④⑤⑥ José Aricó, *Marx y América Latina*, México: Alianza Editorial Mexicana, 1982, p. 166, p. 109, p. 104, p. 229, p. 236.

决也不是“盖棺定论”式的终审判决，而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判决：当时的马克思认为，玻利瓦尔领导的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不是一种推动历史前进的运动，而是一种阻碍历史释放革命潜能的运动。马克思不是一个志在解释历史的理论家，而是一个意图改变历史的革命家。最终，是政治的而非理论的原因，使马克思错过了拉丁美洲，因为马克思认为拉丁美洲不够革命。

可以看到，阿里科在《马克思与拉丁美洲》中的看法是对教条化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继续：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已经完成的系统，没有什么现成的教条可以使人理所当然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意味着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为自由和解放而斗争，这为本土化马克思主义创造了可能，但可惜的是，在历史上主导拉丁美洲的并不是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移植型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浓厚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这就是拉美马克思主义未能与拉美民众实现血肉联结的根本性原因：拉美马克思主义者秉承了“欧洲中心主义”对拉美的轻蔑态度，具有“殖民主义”的形象，无法为拉美民众广泛接受。解决这个问题基本方式就是使拉美马克思主义摆脱“欧洲中心主义”色彩，融入拉美现实，或者说，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拉美化。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不能是来自欧洲的“舶来品”，而要成为拉美本土传统的一部分。

通过梳理拉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流亡墨西哥的阿里科在秘鲁共产党创始人马利亚特吉那里找到了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的典范，盛赞其1928年出版的《秘鲁七论》一书是50年来“拉美马克思主义史上唯一有意义的理论著作”<sup>①</sup>。1930年去世之后长期默默无闻的马利亚特吉被阿里科等人重新发掘之后，逐渐成为“拉美马克思主义思想之父”。阿里科在马利亚特吉那里发现了“反雅各宾主义”<sup>②</sup>，认为其要求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自治的、民主的革命，注重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非雅各宾式的关系。其主要例证是马利亚特吉与“美洲人民革命联盟”领导人阿亚·德拉托雷（1895—1979年）的决裂：马利亚特吉要求保持联盟开放、多面的反帝阵线性质，而德拉托雷则要将联盟改组为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sup>③</sup>。另一个例证是，马利亚特吉反对第三国际激进

<sup>①</sup> José Aricó (ed.), *Mariátegui y los Orígenes del Marxismo Latinoamericano*, México: Ediciones Pasado y Presente, 1980, p. xix.

<sup>②③</sup> Gavin Arnall, Susana Draper y Ana Sabau, “José Aricó Como Lector de Gramsci”, en Oscar Ariel Cabezas (comp.), *Gramsci en las Orillas*, Adrogué: Ediciones La Cebra, 2015, p. 156, p. 158.

的“阶级建党”路线，因为秘鲁的无产阶级非常弱小，应该团结更多的力量，为党寻找更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样才能有效地推动革命<sup>①</sup>。可以看出来，阿里科把马利亚特吉当成了拉丁美洲的葛兰西。葛兰西区分了两个“欧洲”：一个是英国、法国、德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代表的欧洲，还有一个是像意大利、波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外围国家”所代表的欧洲，但这两个“欧洲”都跟俄国代表的“东方”不同，属于“西方”世界。由这个区分，阿里科等人认为，已经经历了一定程度工业化的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等拉美国家隶属于意大利等国家所代表的“第二个西方”，而不是“东方”<sup>②</sup>。由此，拉美就不能走俄国式自上而下的国家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自下而上的变革市民社会的道路，需要在市民社会中通过漫长的“阵地战”建立社会主义领导权，而不是通过“运动战”闪电般夺取国家政权。民主在建立社会主义领导权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文化与政治之间的接合需要通过“激进的民主化”来实现<sup>③</sup>。由此，超越西式代议制民主的“激进民主”成为“科尔多瓦学派”新的基石。但就像马克思的《资本论》没有完成一样，“科尔多瓦学派”对拉美化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也没有完成，阿里科本人在1991年因病逝世，如何通过“激进民主”实现社会主义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科尔多瓦学派”的探索无疑为拉美本土化马克思主义树立了新的典范。

#### 四 结语

“科尔多瓦学派”关注两个互相联系的焦点问题：一个是理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问题，另一个是实践层面的拉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问题。在创立之初，“科尔多瓦学派”企图在理论上突破主导阿根廷共产党的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樊篱，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深入阿根廷社会，在阿根廷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权。在实践上，“科尔多瓦学派”一度接近“游击中心主

---

<sup>①</sup> Gavin Arnall, Susana Draper y Ana Sabau, “José Aricó Como Lector de Gramsci”, en Oscar Ariel Cabezas (comp.), *Gramsci en las Orillas*, Adrogué: Ediciones La Cebra, 2015, p. 159.

<sup>②</sup> José M. Aricó, *La Cola del Diablo. Itinerario de Gramsci en América Latina*, Buenos Aires: Siglo XXI Editores, 2005, p. 120.

<sup>③</sup> Gavin Arnall, Susana Draper y Ana Sabau, “José Aricó Como Lector de Gramsci”, en Oscar Ariel Cabezas (comp.), *Gramsci en las Orillas*, Adrogué: Ediciones La Cebra, 2015, p. 162.

义”，希望通过游击战实现社会主义。游击战道路的失败使“科尔多瓦学派”寻找新的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其基本方向是建立“工厂委员会网络”，但由于劳工运动的领导权在民众主义一边，“科尔多瓦学派”希望实现马克思主义与民众主义的联结，以此推动阿根廷走向社会主义。1976年的军事政变使“科尔多瓦学派”不得不流亡，远离实际的社会政治生活后，流亡的“科尔多瓦学派”得以系统展开对拉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反思，留下了《马克思与拉丁美洲》这样的重要著作。马克思主义在“科尔多瓦学派”的反思中脱去了“欧洲中心主义”或“殖民主义”色彩，成为属于整个世界的文化财富，这为拉美本土化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科尔多瓦学派”还通过回溯拉美马克思主义历史重新发现了拉美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马利亚特吉，牢牢确立了马利亚特吉作为“拉美马克思主义思想之父”的地位，由此，马克思主义成为拉美本土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科尔多瓦学派”还通过对马利亚特吉思想的挖掘，确立了拉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向：拉美不是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所代表的“西方”，也不是俄国等国家所代表的“东方”，而是接近意大利等国家所代表的“第二个西方”，因而，拉美马克思主义应该走葛兰西式的、变革市民社会的“激进民主”道路。“科尔多瓦学派”的基本结论已为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阿根廷人科安（1967年—）就以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为核心线索重整马克思主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非殖民化”，使马克思主义融入第三世界，认为第三世界是马克思真正的家园，因而“马克思是我们的人”<sup>①</sup>。正宗的、反殖民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很可能要在科尔多瓦这样的非欧洲世界寻找。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相比，拉美马克思主义的“科尔多瓦学派”没有留下《启蒙辩证法》这样的“大作”，但其对自由和解放的追求更契合马克思本人的生命历程。马克思本人早年学习哲学，之后转向政治经济学，然后转向实际的政治活动，“法兰克福学派”则从实际政治退回书斋之中、专注于哲学或文化反思。从这个角度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难以称为致力于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相反，拉美马克思主义的“科尔多瓦学派”聚焦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问题，更接近马克思本人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典范。哪一个学派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sup>①</sup> Néstor Kohan, *Marx en Su (Tercer) Mundo; Hacia Un Socialismo No Colonizado*, La Habana: Centro de Investigación y Desarrollo de la Cultura Cubana Juan Marinello, 2003, p. 274.

基本精神，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个世界性现象，正在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人不能仅仅盯着欧洲，也需要看一看欧洲之外更广阔的世界，德国的法兰克福固然值得关注，阿根廷的科尔多瓦同样值得考察。而且，有理由认为，拉美更值得中国人关注。因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拉美化马克思主义都起于对1914—1918年欧洲人互相厮杀的反思，这场欧洲“文明”国家之间的野蛮战争使中国人和拉美人几乎同时开始致力于探索自己的文明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就在1921年这个时代更替的节点成立。此时，在欧洲游历的秘鲁人马里亚特吉同样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他1923年返回秘鲁之后开始探索“印第安美洲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拉美的社会主义运动几乎是同步的。1927年，当拉美人注视着桑地诺在尼加拉瓜对美帝国主义开展的游击战时，中国共产党人发起了南昌起义，创立了人民军队。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焕然一新，而拉美社会主义运动由于未能实现共产党与民众的血肉联结，至今仍在艰难的探索之中。中国和拉美由之分道扬镳。但中国和拉美绝不是彼此无关的两个世界。在1914—1918年战争一百年后的今天，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再次来到一个转折点。中国和拉美也许能够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再次同步，成为命运与共的共同体。

(责任编辑 黄念)